

中国古代的书院

吉艺龙

日前,“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——典籍里的书院”展览正在国家图书馆(国家典籍博物馆)展出。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,发轫于唐代,改制于清末,经千余载传承,弦歌不辍,为中华文明的赓续作出卓越贡献。在历史长河中,先后出现过七八千所不同类型、不同等级的书院。

物有本末,事有始终,在书院产生之前,中华民族已经有了长期的教育实践。三代盛世,学在官府,春秋时期,私学兴起。官学资金雄厚、正统规范,私学充满活力、包容自由。书院的产生与发展,正是借鉴融合了官学、私学两者的优点。

唐代始有书院之名,唐人苏师道《司空山记》中记述的光石山书院,或被认为是最早的书院。据传闻,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南齐。唐代书院有私人、官方两类,先出现的是私人书院,这与当时文人山林读书的风气有关。不久,民间的书院之风吹进皇帝禁宫。唐开元年间,唐玄宗设立丽正修书院,后改名集贤殿书院,书院承担著书、藏书、传讲、顾问等任务。唐代书院与后世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尚有区别,正如清代文人袁枚所称“非士子肄业之所”。

宋代,书院全面兴起,这股势头恰好与宋代理学思想的传播同步。北宋时期有周敦颐、“二程”等在书院讲学,南宋有朱熹、陆九渊等在书院讲学。一种观点认为,理学正因重视书院讲学,才能在学术思想的角力中脱颖而出,在宋理宗时被确立为官方思想,成为中国学术史的重大转折。宋代的书院组织愈发严密,制度愈发完善,被逐渐改造为集讲学、祭祀、藏书、刻书等核心职能于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。宋代流行“四大书院”之说,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见于南宋吕祖谦受邀为朱熹重修书院所作的《白鹿洞书院记》,文中称“嵩阳、岳麓、睢阳及

书院春秋



“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——典籍里的书院”展览现场

国家图书馆供图

是洞为尤著,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”。

元代出现了两件书院史大事件:一件是理学随着书院一同传播到北方,打通了长期的南北学术壁垒,如在燕京创立的太极书院,由被俘北上的赵复执教,成为北方传播理学的中心;另一件是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趋势,政府严格控制书院创建,委派山长,划拨学田,牢牢抓住了书院的人事权与财务权。此后,书院的官学化在明清两朝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

明代,书院的命运一波三折,骤兴骤废。比如明太祖朱元璋重视官学,书院备受冷落,陷入沉寂。到了明中期,王阳明横空出世,高举“心学”大旗,“心学”与书院互为表里,迅速传播,随之出现了一批讲会式书院,吸引大批平民听讲。而书院的平民化、社团化、政治化倾向,又招致了嘉靖、万历、天启年间对书院的三次禁毁。

清初一度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,至雍正皇帝下令设立省会书院,集中人力、财力打造各省文化教育中心,



宋代元明道修本《东莱吕太史文集》(南宋 吕祖谦 撰)

国家图书馆供图

后完善为各府、州、县等级分明的官方书院体系。这些官方书院大多数教师薪水丰厚,学生又有称为“膏火”的助学津贴,体现了官方介入下书院的优势。在官方与私人的共同努力下,清代书院数量激增。清代专注于经史研究与古籍整理的乾嘉学派,其兴起流布与学派学者都与书院紧密相关。典型如学者官员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与广州学海堂,都是乾嘉学派的重镇。有学者高度评价清代书院,称其“制度完备,亘古未有”。相反,随着官学化的加深,也有学者认为清代“书院腐败,等于科举”。

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一些人发现书院教学

内容与世界和时代脱节,遂引入西学改革书院。但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两次下达书院改制谕旨,书院的这一改革进程戛然而止。

书院改制后,西方学校制度逐渐代替了古代书院,但在教学实践中,发现学校的弊端也不少,比如师生不在一起生活,缺少情谊;“一刀切”的管理和教学方式,消磨学生个性;学业太多,挤压学生对多彩世界的关心和自主研究的心思等。有识之士反思教育弊病,又将目光转向了“其则不远”的书院,他们重新理性客观地评价书院的得失,进而在教育实践中吸收书院的长处。比如1923年青年毛泽东发表的《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》称,自修大学就是“取古代书院的形式,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,而为适合人性,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”。这一时期不仅有人研究书院、借鉴书院,还有人恢复书院,最著名的要数抗日战争的民族危亡之际,马一浮、梁漱溟等新儒家代表为保存民族文化、重振民族精神创建的复性、勉仁等书院。

20世纪80年代,学者发起创建中国文化书院,成为现代书院复兴的标志性事件。时至今日,我们在许多古迹景点、大学校园、居民社区都能看到书院的身影。形形色色的书院遍地开花,并以多元的形态融入当下的文化生活。

梳理书院的悠久历史,尽管学者对“何为书院”这一核心问题仍存学术争鸣,但可以确定的是,书院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,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展现出惊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。每一次对书院相关议题的探讨,都是对教育终极目的与更优教学模式的深度思考,为我们永不停歇的教育改革征途注入精神动力、拓展更多可能。而经书院学人代代薪火相传,重视人文、兼容并蓄、求真务实等书院精神,早已超越书院本身的边界,融入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,为新时代发展提供了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图书馆)

文化百科

中国出版集团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石雕

以石块为原料雕刻各种图案和形象以及立体造型的雕塑工艺品。

旧石器时代,中国先民就用锋利的工具在硬度较高的石块上雕刻。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雕已有浮雕人物像。河南安阳商代殷墟遗址中也出土了白色大理石雕刻的人物和动物像。南北朝以后,由于尊崇佛教,出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、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大型石雕佛像。同时,小型石雕工艺品也有发展。唐代,福州寺院的僧侣用当地的寿山石雕刻成佛像、念珠等馈赠香客。福建惠安青石雕刻用于寺院的建筑装饰,如龙柱、石狮等。河北曲阳的汉白玉雕刻佛像在唐代也已闻名。宋代,石雕品种由佛像、建筑装饰等逐渐演变为小型的工艺品以及印章、文具等实用品。明代,浙江青田石雕、山东莱州滑石雕刻等已在民间普及。清代,福建寿山石雕、浙江青田石雕、湖南浏阳菊花石雕等有很大发展,技艺也愈发精湛。

中国石雕主要产于浙江青田、福建福州和惠安、山东莱州、辽宁海城、湖南浏阳、河北曲阳、云南大理等地。

石雕按石料分,有滑石雕刻、汉白玉雕刻、青石雕刻、卵石雕刻、墨晶石雕刻、菊花石雕刻、彩石雕刻等。按产地分,则有青田石雕、寿山石雕等。山东莱州滑石雕刻的品种以猴、马等动物为著名,小巧可爱,常作为儿童玩物。河北曲阳汉白玉雕刻以建筑装饰和佛像为著名。云南大理石雕早在唐代便已闻名,它采用点苍山的大理石为原料,大理石的纹理犹如着色山水画,或危峰断壑、或飞瀑随云,层叠远近、五色灿烂,品种主要有插屏、镶嵌家具以及灯座、观台等。福建惠安青石雕刻以龙柱、石狮、花鸟柱等著名。惠安石狮采用浅雕技法,石狮口中含有滚动自如的石珠,人称“南狮”,享有盛誉。甘肃兰州卵石雕刻系采用黄河河道的卵石雕刻而成,由于卵石的形状、大小、色彩各不相同,所以产品的造型多变,成为深受欢迎的旅游工艺品。此外,内蒙古赤峰的巴林彩石雕刻、辽宁辽阳的太子河石雕刻、湖南洞口的墨晶石雕刻等都各具特色。石雕还可按用途分,主要有建筑装饰、佛造像、人像、文具、玩具、日用品、家具装饰以及陈设欣赏品等。

石雕的技法有阴刻、浮雕、圆雕、浅雕、影雕等。影雕是福建惠安青石雕刻的独特技法,系用大小不同的钢钻在青石上凿鑿,凭借钻点的大小、深浅和疏密来表现山水、鸟兽、人物、花卉等形象。

(作者:朱培初)

木雕

在硬木、龙眼木、黄杨木、樟木、柏木等木料上进行的雕刻,通常也指用木料雕刻成的雕塑工艺品。

早在原始社会,人们使用锋利的细石器在木头上雕刻。公元前5300—前4800年的辽宁新乐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类似大鹏鸟形象的木雕,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木雕。殷商时期的木雕,刻有饕餮纹,有的还髹漆。西周木雕品种有木俑、佛像、建筑装饰、墓葬祭祀品等。在湖南长沙、湖北江陵、河南信阳等地春秋时期的墓葬中,出土了大量的木俑、镇墓异兽木雕。秦汉时期,仍有不少墓葬木俑、车马、鸡、狗、猴座灯、独角兽等木雕,雕工粗犷,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。两晋南北朝,佛教盛起,木雕佛像开始流行。宋代,木雕造像更加兴盛。寺庙的木雕建筑装饰在唐代已很精细,至宋代更臻成熟。宋崇宁二年(1103年)刊行的李诫《营造法式》一书,总结了木雕建筑装饰技艺的经验。明清两代,木雕除佛像、庙宇建筑装饰外,在家宅、祠堂建筑装饰及木雕家具、小型圆雕陈设品等方面都有发展。明清两代的宫廷建筑装饰汲取江苏和广东木雕的特点和技法,精雕细作,富丽堂皇。民间木雕则以浙江的东阳木雕、广东潮州的金漆木雕为主。清末,福建的龙眼木雕和浙江乐清、温州的黄杨木雕兴起。此外,明代以来,通过海外贸易,大批的紫檀等名贵硬木传入宫廷及广州、苏州、扬州、北京等城市,促进了硬木雕刻的发展。

中国木雕主要有东阳木雕、黄杨木雕、金漆木雕、龙眼木雕,以及硬木雕、楷木雕、树根雕刻等。东阳木雕因产于浙江东阳而得名,以浮雕见长。黄杨木雕主要产于浙江温州、乐清,以小型圆雕人物作品为主。金漆木雕产于广东潮州,以浅雕见长,并饰以金箔。龙眼木雕产于福建,饰以髹漆。硬木雕刻以广州、苏州等地为主。楷木雕刻以山东曲阜著名,它以当地的楷木为原料,品种有手杖、人物等。

木雕的原料有硬木(紫檀、花梨、楠木)、龙眼木、黄杨木、樟木、柏木等。雕刻时根据木材的性能因材施艺。如龙眼木质坚而脆,打磨后光泽美丽,年久逐渐呈现古铜色,如同古玩;樟木、柏木的木质脆,便于施刀,但日久容易开裂,因此用樟木雕佛像时需要将中心部位挖空,这样既可使木材干燥后不易开裂,又可减轻重量;黄杨木质坚而细密,适宜于精雕细刻,打磨后呈现象牙般的美丽色泽,雕刻后一般保留本色。

木雕的工艺主要有设计、凿粗坯、雕刻细坯、修光、打磨、染色、涂漆、上蜡、配底座等工序。根据设计意图,首先凿粗坯,即用凿刀雕凿大致的轮廓,一般先正面,后背面,先整体,后局部。要预先保留一部分木料,以防备设计制作时的变化和失误。雕刻细坯即雕刻基本定型的形象。修光是细致地刻画细部,并将表面修饰光亮。打磨是用细砂纸顺木纹摩擦,消除凿纹,使之光洁。黄杨木雕、硬木雕一般保留木材的本色,外表上蜡。龙眼木雕则经染色后再上漆。佛像经修光、打磨后,还需经贴布、上灰地、施彩漆和描金等工序。

(作者:卢莹)

条目来源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(有删节)

一脉芬芳话香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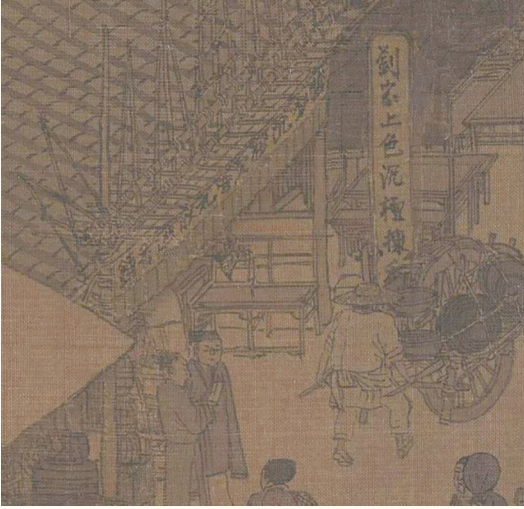
周 集



清院本《十二月月令图》之五月(局部)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

相应”的中医哲学,凝结着“顺应天时、调和阴阳”“治未病”的理念。在清代《十二月月令图》五月的画卷中,我们可以窥见古人端午防疫的生活图景:一座敞开的厅堂内,摆放着一排古朴的药柜,柜前高几上,葫芦形的药瓶静静伫立,这里便是园林中的药房。采来的艾叶、菖蒲、苍术等草药,或熬汤沐浴,或制成雄黄酒,也可以将草药装入锦囊,随身佩戴,是为香囊。画中那个梳着总角发式的孩童,身后背着的就是这种香囊。香囊又称“长命缕”,是端午时节的厌胜佩饰,承载着避邪祈福的寓意。

以香囊辟疫,源于中医“衣冠疗法”的智慧。《黄帝内经》提出: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。”古人很早就认识到“邪气”可以从口鼻而入,因此希望利用芳香类药物的挥发性,通过口鼻吸入和皮肤渗透,达到扶助正气、驱逐邪气、调整机体、预防疾病的作用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,揭开了西汉贵族防疫的“秘方”:茅香、桂皮、花椒、高良姜、杜衡、辛夷、佩兰、干姜……这些药物不仅香气浓郁,还具有温中散寒、辟秽祛湿的功效。现代科学研究证实,茅香中的香豆素类成分具有抗菌作用,花椒和高良姜也有抑制致病菌的效果。东晋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记载的“虎头杀鬼方”,是将虎头骨、朱砂、雄黄、雌黄、皂荚、辛夷等材料制成



宋代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民间香料铺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

香囊佩戴,以宣通气机、燥化湿浊。如今,尽管部分药材如虎骨已不再适用,但其组方思路仍为现代芳香防疫提供了参考。

古人佩戴香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。《礼记·内则》注曰:“容臭,香物也,助其形容之饰,以纓系之。”这是香囊最早的形态。春秋战国时期,佩戴香囊的风俗日渐兴盛。屈原《离骚》云: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。”江离、辟芷、秋兰都是香草,连缀在一起,作为索佩、佩帙,与香囊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汉魏时期,“香囊”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在文献中。东汉繁钦《定情诗》云:“何以致区区,耳中双明珠。何以致叩叩,香囊系肘后。”可见,当时的香囊是系在肘臂之下、藏于袖中的,让微微香气从袖筒中散发出来。

唐代,熏香习俗伴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,产生了可以焚香的金银材质香囊。唐代香囊制作得精致且便于携带,当时贵族阶层的男女都会将其佩戴在身上,或悬挂于车辇上,岁终祭祀百神之日更需佩戴。白居易的“拂胸轻粉絮,暖手小香囊”,就描绘了唐代贵族女子佩戴小香囊暖手的场景。

宋代,海内外香料贸易已非常发达。香料与茶、盐在宋代都属于官方专卖品,香料满足了宫廷需求后,又流入民间,每年为政府带来大量税收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有一家店



唐代鎏金银香囊(中国国家博物馆藏)

的招牌上就写着“刘家上色沉檀拣香”。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中收录了多种香药方剂,比如“苏合香丸”“安息香丸”等,皆以芳香开窍、辟秽化浊为要义。

明清时期,香囊制作更加发达,不仅材质多样,有绸、缎、锦、纱之分,纹样也极为丰富,常见五毒、八卦、莲花、寿字等吉祥图案,寓意驱邪纳福,达官显贵几乎人人佩戴,民间亦流传“带个香草袋,不怕五虫害”的俗语。

时至今日,香囊的身影依然出现在现代生活中,其制作方式和材质也愈发多样化。传统的苏绣、蜀锦面料,现代的纳米缓释技术……古老智慧正与现代科技巧妙融合。杭州亚运会的“十二生肖抗菌香囊”,便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范——既保留了传统刺绣工艺,又添加了纳米银离子材料,增强了抗菌性能。

一枚小小的香囊,包裹着草木的精华,传承着安康的祈愿,散发着文化的芬芳。从屈原《离骚》中“纫秋兰以为佩”的高洁,到《孔雀东南飞》里“红罗复斗帐,四角垂香囊”的雅致,再到《红楼梦》中牵连着宝黛情愫的香袋,几千年来,香囊也已超越了防疫的实用功能,成为文化与情感的载体,那缕芳香穿越时空,延续着一份悠远的文明记忆。

(作者系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,图片由作者提供)

掌故丛谈